

改革开放 口述史

主编 欧阳淞 高永中

改革
开放

014005646

D616
396(T)



改革开放 口述史

主 编 欧阳淞 高永中
副主编 陈 夕 刘荣刚

D616
396(T)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北航

C169237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革开放口述史/欧阳淞, 高永中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300-18435-7

I. ①改… II. ①欧…②高… III. ①改革开放-历史-中国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8046 号

改革开放口述史

主 编 欧阳淞 高永中

副主编 陈 夕 刘荣刚

Gaigekaifang Koushu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印 张 47 插页 3

字 数 672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8.00 元



北航

C1692379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欧阳淞

1978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自强不息、顽强拼搏、与时俱进新的壮丽史诗。

回顾过去，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的重要前提下进行的，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30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坚定不移地推向前进的。30多年来，正是改革开放激发出的强大活力，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这3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与时俱进。实践充分表明，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

大革命，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展望未来，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党的十八大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重大部署，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之一，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到地方调研，就是到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是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这些都充分表明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他还强调，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我们要深刻领会，认真落实习总书记的这些重要指示精神，要看到，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要把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落实好，就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客观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的重大历史责任。

为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2013年以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决定在统筹谋划、深入调研、科学组织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重点、集中力量，加强对改革开放历程、成就和经验的研究，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力争在几年时间内形成系列研究成果。加强改革开放史研究，要以丰富的资料作基础。而征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资料，有一个独特优势和有利条件，这就是亲身经历和见证这段历史的老领导、老同志大多数都还健在。他们的回忆录、口述历史，正

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和宝贵财富。多年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直十分重视征集有关回忆录和口述历史，先后采访了几百位老同志，积累了逾千万字的资料。在此基础上，经过系统梳理、精心选编，形成了现在这部《改革开放口述史》。它选择改革开放30多年历程中的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以口述史的形式，让亲历者追忆细节，让见证者感悟得失，让思想者升华经验，目的是真实、生动、具体地再现历史，为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也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提供生动鲜活的新时期党史读本。

《改革开放口述史》是一部兼具思想性、史料性、可读性的有特色的史学著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就要进一步认识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我们相信，《改革开放口述史》对广大读者进一步认识这些道理，是会有所帮助的。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历史研究也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改革开放亲历者、见证人年事已高，有些已陆续离开我们，征集改革开放口述史的工作刻不容缓。我们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认真抓紧抓好这项工作。历史创造者在不断前行，广大党史工作者应当即时跟进历史，及时记载党和国家事业新的实践，研究总结新鲜经验。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和离退休老同志同我们一道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历史研究，科学总结和自觉运用改革开放历史，帮助人们更好地牢记过去、把握现在、开辟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尽一份历史的责任！

目 录

- 我所经历的北京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 刘导生 / 1
- 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 万里 / 10
- 回顾安徽的农村改革 周日礼 / 24
- 邓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 谷 牧 / 53
- 宝钢：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新模式 陈锦华 / 66
- 乡镇企业艰难的发展历程 张 毅 / 96
- 中美建交亲历记 柴泽民 / 110
-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回顾 伍修权 / 125
- 1980年全国第一届县级直接选举工作 白益华 / 143
- “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由来 田雪原 / 162
- 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 龚育之 / 170
- 关于1982年宪法的起草过程 王汉斌 / 188
- 邓小平与中央顾问委员会 荣高棠 / 212
- 胡耀邦与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 阎明复 / 223
- 法制讲座走进中南海 邹 瑜 / 235
-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诞生记 白益华 / 241
- 创建深圳经济特区初期的两次“大争论” 邹尔康 / 255
- 深圳拟发特区货币的前前后后 周溪舞 / 261
-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诞生前后 谢明干 / 270
-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亲历记 周 南 / 295

科技体制改革与“863”计划	杨培青 / 318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前后	顾迈男 / 332
解放军恢复军衔制的台前幕后	贾若瑜 / 341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追忆	李景贤 / 350
中国与原苏联各共和国建交始末	田曾佩 / 367
我所经历的经济体制改革决策过程	徐景安 / 378
国家体改委志在改革	陈锦华 / 391
回忆邓小平 1992 年南方之行	陈开枝 陈建华 姚欣耀 / 40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设计	
——参加起草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回忆	王梦奎 / 420
我国股份制改革历程的回顾	刘鸿儒 / 435
1994 年财税体制改革回顾	刘仲藜 / 446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住房制度改革回顾	陈学斌 / 462
从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到“软着陆”成功	陈锦华 / 480
长江三峡工程的决策	魏廷琿 / 513
我所知道的重庆设立直辖市经过	
——接受访谈时的谈话	蒲海清 / 532
我国五天工作制出台始末	胡 平 / 542
筹备香港回归祖国的日日夜夜	朱育诚 / 553
亲历澳门回归	康冀民 / 567
回顾 1997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戴相龙 / 580
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提出和实施	曾培炎 / 589
西部大开发十年之管见	王志宝 / 604
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回顾	石广生 / 615
博鳌亚洲论坛的创立与发展	陈锦华 / 634
全国社保基金的建立和初期发展	刘仲藜 / 650
亲历台湾三个政党大陆访问团访问北京	龙新民 / 664
南水北调工程决策经过	张基尧 / 675
建设青藏铁路的伟大决策	张国宝 / 696
李岚清副总理与北京申奥	李景贤 / 704

我所经历的上海世博会申办工作	徐匡迪 / 712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宏观调控	刘国光 / 729
后 记	743

我所经历的北京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

刘导生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这场讨论，为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我国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然而，当时由于人们还受到“左”的思想的束缚，思想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所以这一讨论也并非一帆风顺。

1978年12月26日，我被中央正式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先是任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81年3月起任市委书记，分管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作为北京市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我对北京市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艰难曲折的历程，至今记忆犹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我的新岗位

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执行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然而粉碎“四人帮”后，当时的主要领导人继续执行“左”的路线，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明确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方针严重阻碍了对“文化大革命”及其遗留问题的解决，阻碍了拨乱反正，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北京市原来在“四人帮”及其亲信谢静宜的直接控制下，各方面

均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问题如山，而北京市的某些领导人一时也没转弯，积极贯彻“两个凡是”，甚至把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要求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急切愿望视为异端。突出的例子，如1977年1月李冬民等十多名青年刷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任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即被扣上“反革命罪”的帽子逮捕入狱。

1977年7月，邓小平在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复出，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从教育、科学工作入手，进行拨乱反正。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得到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以不怕“入地狱”、“下油锅”的气概，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解决“文化大革命”及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亲自组织和发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从思想理论上有力地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1978年11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确立了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深深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非同一般，我们党就此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套，从“左”的路线的泥沼中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本报特约评论员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最近报刊发表的一九四九年，薄一波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即自己思维与客观存在的符合。思维对实践的真理性的认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证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07页）这段话对于我们一切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尖锐的警告，不是实践，不能检验真理的真理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两个凡是”的严重干扰下，薄一波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客观的检验，而是依靠主观的臆断，这是错误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07页）这段话对于我们一切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尖锐的警告，不是实践，不能检验真理的真理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

门罗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客观的检验，而是依靠主观的臆断，这是错误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07页）这段话对于我们一切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尖锐的警告，不是实践，不能检验真理的真理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

个马克思主义者说真理的检验，不仅在于它一定能在一个两个知道的东西，而且在于它能在实践中得到证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07页）这段话对于我们一切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尖锐的警告，不是实践，不能检验真理的真理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

薄一波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客观的检验，而是依靠主观的臆断，这是错误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07页）这段话对于我们一切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尖锐的警告，不是实践，不能检验真理的真理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

薄一波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客观的检验，而是依靠主观的臆断，这是错误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07页）这段话对于我们一切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尖锐的警告，不是实践，不能检验真理的真理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

薄一波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客观的检验，而是依靠主观的臆断，这是错误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07页）这段话对于我们一切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尖锐的警告，不是实践，不能检验真理的真理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

薄一波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客观的检验，而是依靠主观的臆断，这是错误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07页）这段话对于我们一切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尖锐的警告，不是实践，不能检验真理的真理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

薄一波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客观的检验，而是依靠主观的臆断，这是错误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07页）这段话对于我们一切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尖锐的警告，不是实践，不能检验真理的真理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

薄一波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客观的检验，而是依靠主观的臆断，这是错误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07页）这段话对于我们一切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尖锐的警告，不是实践，不能检验真理的真理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

薄一波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客观的检验，而是依靠主观的臆断，这是错误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07页）这段话对于我们一切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尖锐的警告，不是实践，不能检验真理的真理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我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四天，被中央正式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就任前，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找我谈话，

说中央准备调我到北京市工作，职务不高，但却是一项艰巨任务，因为北京市的工作长时间推不开，受“左”的影响太深了，很多事情阻力很大。他还说到，过去毛泽东批评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虽然是错批彭真的一个借口，不过中央的干部到北京市去工作的确不太容易。他要我加倍谨慎，有事情可以多找中央宣传部商量。

因为刚开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的内心同许许多多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一样，无比兴奋，渴望在自己的余生能为党、为人民尽心尽力地做些工作。当然，想到胡耀邦的叮咛，我对新的岗位还是有如履薄冰的感觉。

果然，我到市委宣传部一上班，就感到气氛颇为紧张。不少在职的干部以戒备的心态对待我，冷言冷语，一问三不知，采取不合作态度。有些人对于自己以前紧跟“四人帮”的那一套不认为错了，只认为自己现在倒霉了。有些参加过市委写作班子（住在香山红光寺，发表的文章就署名“洪广思”）的干部，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两年多了，全国的揭批查也搞了很久了，但在这里却一直没有触动过。如今听说我来，认为往后日子不好过，一时不少人提出要调离。我再三说服挽留，仍然说不动一些人。后来我想强扭的瓜不甜，勉强留下也不是个办法，就说愿意留下的我欢迎，实在要走我只好欢送。最后，一位副部长和办公室主任还是先后调走了。

后来听说，中央要调我到北京市工作，酝酿已久了。中央组织部正式上报后，中央某些领导人置之不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调任中央秘书长（当时还未恢复总书记和书记处）后，这一方案才得以实施。如此说来，我到北京市上班受到冷遇也就不奇怪了。

把干部的思想统一起来

于1978年5月在全国许多地方开展起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但是半年多来北京市几乎纹丝不动，三中全会之后北京市委仍然犹豫观望。这时，我出席了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明确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

大意义，正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我感到北京市的工作百乱待理，要跟上中央的部署和全国前进的步伐，首要的一环就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尤其是补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

1979年3月，全国兴起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我认为首先应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仅仅是一般号召不行，必须对各级干部进行轮训。同时还应动员舆论界进行广泛的宣传，形成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氛围，以冲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束缚，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觉悟。我向当时的北京市委主要领导汇报，北京市委宣传部准备先召集一个各大学和研究单位约五六十人参加的座谈会。第二天，答复说，上海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把群众的思想搞乱了，他们不得不让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出面干涉，不准宣传。因而，他也不同意我们召集这次座谈会。

我感到真是无法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不能宣传，宣传了就要搞乱群众的思想，这究竟是哪些群众，究竟有多少群众仍然坚持林彪、“四人帮”的“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不放，实在令人怀疑。难道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的定论对着干就不会搞乱思想？我还无法理解的是，如果对中央决定的方针有疑问，不向近在咫尺的中央请示，而向上海看齐，这也是不符合组织原则吧。我只好说“如有问题，我负全责”。我们便于3月5日至9日召集了由北京各高等学校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市委各部、委、办负责同志，以及市属各宣传单位主管理论工作的同志共五六十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成效。

在这次座谈会上，我在讲话中首先肯定北京市的理论工作者在和“四人帮”进行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只是由于市委长时间迟迟不动，揭批林彪、“四人帮”很不得力，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没有组织全市性的活动，致使我们的理论工作落后了一大步。

我们北京市的理论工作要跟上党中央的步伐，适应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新形势，就必须坚决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端正思想路线，迅速扭转目前的落后状态，迎头赶上，使我们广大理论工作者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和推动经济建设的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我还提出，这是党内的座谈会，应当发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的会风，没有什么框框。我们提倡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各种禁区，敢于打破各种精神枷锁，敢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敢于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理论上的勇气，掌握了真理，就要无所畏惧，所向披靡。同时我还说，要提倡“三不主义”，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会议简报上的发言，由本人定稿，会议不审查，也不作结论。这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畅所欲言，同时也提出了许多问题，并对宣传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为了推动北京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我们又请北京市哲学学会于7月24日召开座谈会，组织崇文区、电信局、昌平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负责人和教师结合本单位的情况发言，并在《北京日报》上对座谈会做了长篇报道，加以宣传推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两个凡是”的观点被放弃。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国规模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解放思想，打碎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他们的精神枷锁，使毛泽东同志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得到恢复和发扬。”在此前后，邓小平在上海、山东、天津等地多次讲话，都讲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他指出，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我们不解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靠不住。政治路线解决了，要看是什么人来具体执行，政治路线正确，执行得好不好不一样，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胡耀邦也指出，要继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开展全国性的补课。

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市委终于决定召开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中心

议题是如何搞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这是北京市委正式研究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

1979年9月12日至29日会议顺利举行，各区、县、局一把手全部参加，由我作主报告，同时邀请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朱穆之作报告。朱穆之阐述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重要意义，严肃批评了当前阻碍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若干错误倾向。他的讲话对北京市的宣传工作是很大的推动。在会上，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旗帜鲜明地讲了话。

我的报告首先肯定北京市委和各级党委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精神所做的很多工作，同时指出北京市在解放思想，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方面做的还很不够。现在不少干部对这两次会议还有不少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如有的人认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丢了纲，离了线”，提出主要矛盾已经变成“阶级斗争熄灭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是“搞翻案，是否定历次的政治运动”，给地主、资本家、右派摘帽或改正，是“解放百分之五，压制了百分之九十五”；坚持按劳分配，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搞修正主义的一套”；引进先进技术，是“放弃自力更生原则”；吸引外国资金，同外资合作办厂，是“消灭了国内资本家，又引来了外国资本家”；等等。总之，他们指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右了，方向偏了，担心搞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过十个月了，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也已开过三个月了，还有一些人对党的方针政策怀疑、抵触，少数人甚至公然反对。

为什么现在还有这样严重的思想问题呢？我指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揭批林彪、“四人帮”搞得不深不透，前期是市委按兵不动，后期是市委只注意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而对政治、思想理论方面的流毒没有认真加以肃清；二是思想路线问题没有解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没有认真抓，尽管1979年5月市委扩大会议就提出要补上这一课，由于工作没有跟上，有的单位还按兵不动，补课仍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我在报告中强调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并提出了补课

的一系列措施。

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并同意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要首先补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贾庭三和多数常委都发言支持我的报告。这次会议对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尤其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起了决定性作用，不过阻力仍然存在。

补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

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后，我们在全市范围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补课工作。

这次补课从各级干部的思想上说，主要是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关于真“高举”和假“高举”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一种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左”倾教条主义态度，如王明就是一切从本本出发，理论脱离实际，还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结果使我们党遭到惨重的失败。另一种就是毛泽东及其战友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结果将中国的革命引向胜利。现在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方针政策，对毛泽东的诸多指示，同样不能句句照搬，把本本当作“圣经”，仍然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恢复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确的加以坚持，错了的加以改正，这才是真“高举”。

其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就是要紧密联系实际，拨乱反正，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肃清其流毒。“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无限夸大主观意志、主观精神对客观世界的反作用，颠倒客观和主观、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不是用实践检验我们的主观认识，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只凭主观想象办事。本来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党的八大提出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满足不了人们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全党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生产力上来。只是由于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大搞政治运动，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未能得到贯彻。（2）习

惯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片面夸大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唯一动力，而且说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范围越来越广泛，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如今把重点转移说成是“丢纲离线”，所谓“离了纲心发慌”。(3)把抓生产说成是“唯生产力论”，把按劳分配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思想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代替和取消生产斗争、科学试验，而对任何领导、管理和从事生产的努力都加以反对。这些现象流毒之深，对经济建设的阻碍、破坏十分严重。

在向全市各级党委部署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补课工作时，我特别强调，要充分认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指出如不扫除多年来“左”的思想障碍，那么平反冤假错案、搞四化建设都无从说起，也无法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更谈不上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是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是全党的大事，绝不只是宣传部门的工作问题。各级党组织的一把手必须亲自抓，坚决防止走过场。

为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北京市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积极配合，着力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统一他们的思想。我们首先恢复了北京市委党校，开办区、县、局领导干部学习班。自1979年5月至1982年7月，学习班共举办了37期，参加学习的领导干部有4597人。我们又部署各区、县、局和高校、工厂、公司、公社、街道的党委，组织党委领导成员集中学习一段时间进行补课。据统计，18个区县共办学习班1144期，轮训干部8万多人。

在培训开始时，一些人想不通，说我这是反对毛主席。那时候“两个凡是”还有一定的影响，说我反毛主席这个帽子是很吓人、压力很大的。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很多干部思想都框在“左”的错误和个人崇拜之中，不少人转不过弯来。他们虽然觉得我们说得有道理，他们也不满意“四人帮”，但在感情上，对有些问题一时还不能接受。他们不了解，对毛泽东的伟大功勋应当歌颂，应当赞扬，但对他晚年的错误应当加以否定，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党的原则。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毛泽东是神。这个紧箍咒很厉害，我在这么多期培训班上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时很少有人公开表示赞